

故  
印

般  
羅

# 關於圓覺經問題

幻生

## 讀「胡適禪學案」有感之一

日人柳田聖山先生，搜集胡適博士有關禪學論著文字，及胡先生晚年寫給入矢義高與柳田聖山二氏論禪學書簡的手稿真跡，彙編為「胡適禪學案」一書，由台北正中書局影印出版。此書去年出版之際，曾見報章刊載發售廣告，因不悉內容如何，未予購買。今年夏間，去台中授課，因事路過中山路正中書局門前，以新台幣二百四十元售價，購買一冊。歸來費二三日之時，細讀胡先生治禪學歷史文字，感觸良多，為文一述。

胡先生自民國十一年起，開始治禪學歷史，直至其去世之際，其間歷四十餘年，孜孜不斷從事禪宗史的研究，此種治學的偉大精神，委實令人欽佩敬服！尤其難得的，胡先生對於我國業經散失的許多重要禪宗古籍，不惜萬里迢迢的從大英帝國倫敦大英博物館及法國巴黎圖書館所藏的敦煌石室寫本，搜集照相回來，並與日本所藏之中國古本，校勘整理出版，提供研究中國禪宗史許多新的珍貴資料。由於胡先生的努力與研究，其影响所及，引起中國一般學者對禪宗史的重視，開創新的研究風氣，運用新資料，擺脫過去的傳統舊說，澄清許多附會與傳說的史實。這些，是胡先生對禪宗史的偉大貢獻，功不可沒！不過，胡先生對於禪宗史研究的成果，我們本着治史的客觀立場來看，胡先生有些研究的結論非常正確，令人信服；如禪宗二十八祖的考證等文，都是很有價值的。但是，胡先生的研究論斷，有些也是令人不敢苟同的，必須再作研究商榷。胡先生令人不敢苟同的部分論斷，有些由於對古典資料的處理與運用問題，有些由於胡先生未加深入考證，僅憑自己的主觀妄斷而來，顯然與史實不符。

綜觀胡先生對禪宗史的研究，他似乎不肯從純正客觀立場着眼研究論述，處處都呈現其獨自的主觀性。由於此種主觀心態的呈現，故其研究的某些結論，也暴露其治學的偏見。此種偏見，固然不能為中國傳統的佛學研究者所同意接受，即對近代重視史實根據的日本佛教學者，也不能同意胡先生研究的論斷。胡先生治禪宗史四十餘年，其中遭遇的困難，似乎比治其他歷史為多，此一根源，大概來自胡先生既存的主觀意識形態。胡先生治學，一向自詡細心，不說沒有歷史根據的話，這或者只限於胡先生治一般學問的情形，但他治禪宗史，却沒有完全做到這一細心謹慎的工夫，有些跡近大胆想像的論斷，未從史實上尋求根據，確立其說，這是胡先生治禪學史的一大疏失。胡先生的這種疏失，純然是史實問題，並不是胡先生所說他不是佛教徒與佛教徒的看法相異問題。

「胡適禪學案」共分四部，其中第三部，收錄胡先生「禪宗史的一個新看法」。這篇文章，為胡適先生民國四十二年由美返台，一月十二日在蔡子民（元培）先生八十四歲誕辰紀念會上的講稿，當時由報章雜誌刊載之後，曾經引起佛教界許多人士寫文批評駁斥，其時筆者年輕，所讀佛典不多，對於此類問題，不敢妄加置喙。如今事隔二十餘年，筆者年事稍長，而涉獵之佛典範圍較前為廣，現在重讀胡先生此文，對於這位一代學人的禪宗史的新看法，總有不能已於言者的感嘆。二十年前，佛刊中評論胡先生此文的文字，由於刊物不易尋找，無法重讀，不知評論者持論是否中肯。茲就個人所見，胡先生此文，其中值得商榷研究之

處頗多，最顯明的，胡先生論及圓覺經問題，指爲宗密所僞造，此純爲胡先生毫無史實根據的大胆妄測。以一個治歷史的學者而言，不經過歷史的考察求證，盲目地妄下論斷，此可見胡先生治禪宗史的成果。關於圓覺經問題，我想提出我所見及的歷史資料，以證胡先生所言之謬。胡先生在此文中說：

『現在佛教中，還有一部圓覺經。這部經大概是僞造品，是宗密自己作的。這只有一卷經，他却做了很多的註解，叫做「圓覺經大疏鈔」。這裏面有很多禪宗歷史的材料。』（見「胡適禪學案」五四〇頁至五四一頁）。

這是胡先生指圓覺經爲僞造的，並且肯定它是宗密僞造的文字。關於圓覺經是否爲僞造的問題，是否爲宗密僞造的問題，我就所見的古典資料，作一論述。

懷疑圓覺經爲僞造的經典，並不是胡先生的創說，「古已有之」。其懷疑的關鍵，爲圓覺經翻譯的年月不明，其譯者——佛陀多羅（Buddhatrata）在中國最後所終之歷史欠詳。因爲有這二個原因，古人對之起疑。智昇在「續古今譯經圖紀」及「開元釋教錄」卷九中說：

沙門佛陀多羅，唐言覺救，北印度罽賓人也。於東都白馬寺譯圓覺了義經一部。此經近出，不委何年。且弘道爲懷，務甄詐妄。但真詮不謬，豈假具知年月耶？（大正五五·五六五上）。

從智昇的這段文中，雖然爲圓覺經僞造之事而辨，但是，我們知道，其時已經有人對圓覺經的來歷起疑，這是鐵錚錚的事實。所以，胡先生之說，並非他的創說。

關於佛陀多羅的歷史，贊寧的「宋高僧傳」卷二，雖然有其傳記，但傳記的主要內容，還是依據智昇的「開元釋教錄」而來。如「宋高僧傳」說：

佛陀多羅，華言覺救，北天竺罽賓人也。齋多羅夾，誓化支那。止洛陽白馬寺，譯出大方廣圓覺了義經。此經近譯，不委何年。且隆道爲懷，務甄詐妄。但真詮不謬，豈假具知年月耶？救之行迹，莫究其終。大和中，圭峯密公著疏，

判解經本一卷，後分二卷成部，續又爲鈔，演暢幽邃。今東都太原三蜀盛行講演焉。（大正五〇·七一七下）。

宗密在「圓覺經大疏」卷上之二，敘述圓覺經的翻譯及其弘傳情形說：

叙昔翻傳者，開元釋教目錄云：沙門佛陀多羅，唐言覺救，北印度罽賓人也。於東都白馬寺譯，不載年月。續古今譯經圖記，亦同此文。北都藏海寺道詮法師疏又云：羯濕彌羅三藏法師佛陀多羅，長壽二年，龍集癸巳，持于梵本，方至神都，於白馬寺翻譯，四月八日畢。其度語、筆受、證義諸德，具如別錄。不知此說，本約何文素承？此人學廣道高，不合孟浪。或應國名無別，但梵音之殊，待更根尋，續當記載。然入藏諸經，或失譯主，或無年代者亦多。古來諸德，皆但以所詮義宗，定其真僞矣。前後造疏解者，京報國寺惟愍法師，先天寺悟實禪師，薦福寺堅志法師，並北京詮法師，總有其四。皆曾備計，各有其長：愍邈經文，簡而可覽；實述理性，顯而有宗；詮多專於佗詞；志可利於羣俗。（續十四·一一九d——一二〇a）。

由宗密的這段記述，可以知道宗密對其以前有關圓覺經歷史及其注疏，他都仔細讀過；至於懷疑圓覺經爲僞造的問題，他也知之甚詳。所以，他在這段文中，首先引用智昇「開元釋教錄」，說明圓覺經的翻譯年月不明，致令人起疑。而後，他又引用道詮「圓覺經疏」，說明圓覺經譯於長壽二年（六九三）。不過，其度語、筆授、證義、潤文諸德，具如別錄。宗密對於這二家之說，似乎都不大同意，他在「圓覺經大疏鈔」卷四之上，對此有所評述說：

目錄（幻生按：指開元錄）云：此經近出，不妄（委？）何年。且弘道爲懷，務甄詐妄。但真詮不謬，豈假具知年月耶？評云：余謂但云不知年月即得，何必加此數言，故疏中不載耳！

……言龍集者，有釋云：高宗大帝，當其年龍飛，以王天下。此說恐謬。曾見有處說：長壽年是則天之代（幻生接

：長壽爲武則天稱帝年號之一，共有二年，即西元六九二——六九三年。唐高宗死於弘道元年十二月，那年爲西元六八三年，歲次癸未。弘道爲永淳二年十二月的改元年號，大概改元不久高宗便歿。道詮「圓覺經疏」所記，『長壽二年龍集癸巳』，癸巳確爲長壽二年歲次。將龍集釋爲高宗大帝之事，此說謬矣！），然今亦未委其指的也，待更尋檢。疏具如別錄者，復不知是何圖錄？悉待尋勘。有釋云：證義大德，是京兆皇甫氏、范氏，沙門復禮、懷素。又指度語筆授云：在白馬寺譯經圖記。此等悉難信用。謂證義筆授等，何得半在此記，半在彼圖？乍可知，不得妄生異說。堅志法師疏，說譯主年月，並與藏海疏同，唯云天竺三藏羯濕彌羅爲異耳。余又於豐德寺難（雜？）經中，見一本圓覺經，年多蟲食，悉已破爛，經末兩三紙，才可識辨。後云：貞觀二十一年，歲次丁未，七月乙酉朔，十五日己亥，在潭州寶雲道場譯了。翻語沙門羅睺曇犍，執筆弟子姜，道俗證義大德智晞、註紘、慧今、寶證、道脉，然未詳眞虛。或恐前已會譯，但緣不能聞奏，故滯於南方，不入此中之藏。不然者，即是詐謬也。（正續一四·二八二b——c）。

就「圓覺經大疏鈔」這段釋文來看，宗密對智昇與道詮之文都有批評。尤其對於道詮所記，『其度語、證義、筆授、潤文諸德，具如別錄。』更感到不能同意，而致疑慮。關於道詮疏中所說「羯濕彌羅」國名，大概是玄奘譯的「迦濕彌羅」（Kaśmīra）的不同音譯。迦濕彌羅，便是罽賓，這是不成問題的。所以智昇「開元錄」所記佛陀多羅的國籍，與道詮所說，名稱雖然不同，但所指却是一致的。至於宗密在終南山豐德寺所見的另一圓覺經殘本，末後記爲貞觀二十一年七月在潭州寶雲道場譯出，其主譯者及執筆、證義者，均與長壽二年不同，這顯然是另一譯本。不過，貞觀二十一年（六四七）的譯本，既然未見入藏著錄，而比貞觀本晚出四十六年的長壽二年（六九三）本，却已入藏著錄，在時間上，不無總會令人起疑的。

綜上以觀，懷疑圓覺經爲僞造的經典，由來久矣，非爲胡先生的創說。不過，胡先生指圓覺經爲宗密僞造的此一說法，是毫無歷史根據的。圓覺經最早被記載於經錄，始於智昇的「開元釋教錄」。開元錄成於唐玄宗開元十八年（七三〇），宗密生於唐德宗建中元年（七八〇），卒於唐武宗會昌元年（八四一）。從開元十八年到建中元年（七三〇——七八〇），恰好五十年。明白地說，早在宗密出生以前的半個世紀，圓覺經已經記載在「開元錄」了，胡先生怎麼能說圓覺經是宗密僞造的？胡先生治學一向是講求歷史根據的，他處處也要人拿出證據來，我不知道胡先生指圓覺經爲宗密僞造的這一論斷，是否也能提出強有力的古籍的歷史證據來，以證其說？如果胡先生提不出歷史證據，僅僅憑着自己的主觀心態妄測，遽下論斷，顯見胡先生對現存許多古籍資料，並沒有去做細心的閱讀研究工作，完全閉着眼睛抹煞史實在胡扯了！這種治禪宗史的方法與態度，其研究的結論與成果，在一個真正從事歷史考據的工作者看來，簡直是幼稚得可笑了。

圓覺經與宗密有着很深的因緣關係，這是研究宗密歷史者所共知的。宗密出家後的大半生，差不多都是致力圓覺經的研究。他爲圓覺經寫的注疏，不僅數量驚人，其對義理的闡發，在佛教史上，也堪稱獨步空前。宗密先後爲圓覺經寫的注釋，計有：『圓覺經大疏』三卷，『圓覺經大疏鈔』十三卷，『圓覺經畧疏』二卷，『圓覺經畧疏鈔』六卷，『圓覺經纂要』二卷，『圓覺經道場修證儀』十八卷。依據宗密在『圓覺經大疏鈔』中，敘述他與圓覺經的因緣關係說：

宗密爲沙彌時，於彼州，因赴齋請，到府吏任灌家，行經之次，把著此圓覺之卷。讀之兩三紙，已來不覺身心喜躍，無可比喻。自此耽翫，乃至於今。不知前世曾習，不知有何因緣，但覺耽樂澈於心髓。訪尋章疏，及諸說匠伯，數年不倦。前後遇上都報國寺惟慤法師疏一卷，先天寺悟實禪師疏兩卷，薦福寺堅志法師疏四卷，北都藏海寺道詮法師疏三卷，皆反復研味，雖互有得失，皆未盡經之宗趣分齊；雖逢講者數人，亦無異螢燒妙高矣。（正續十四·二二三a）。

這是宗密的自述。當宗密初出家時，在四川已有圓覺經的流

傳，而且講解與注釋圓覺經的，不乏其人。宗密對於當時弘揚圓覺經的「匠伯」，他都訪尋親近過；對於當時流傳的圓覺經章疏，他也尋得四種，備作研究參攷。宗密並對這四家注疏，加以評述說：「慤邈經文，簡而可覽；實述理性，顯而有宗；詮多專於陀詞；志可利於羣俗。」（見上引「圓覺經大疏」；正續十四·一二〇a）宗密的這些自述，我懷疑胡先生根本沒有去看，不然，胡先生怎會輕率無知到如此程度？

宗密對其以前的四家注疏，以惟慈疏評價為最高，他在「圓覺經大疏」等屢屢引用。今就其文中註明引自惟慈疏之文，摘錄如下：

（一）見於「圓覺經大疏」者：

1. 慈云：首楞歎虛空之小，圓覺嗟法性之寬，比之常談海形牛跡。（正續十四·一二五a）
2. 慈云：大士張教，綺互相承，若一人請周，餘當杜述。（正續十四·一四一b）
3. 慈云：驗今聞悟頓契佛心，方達宿因。（正續十四·一七三d）
4. 慈云：然覺心初建，力尙尪徵（微？）理宜處靜安詳，方能展照。（正續十四·一七六b）
5. 慈云：標乎創智者，卽初悟也；取靜爲行者，雖悟卽動卽靜……。（正續十四·一七八a）
6. 慈云：慧光圓發，根識俄消。（正續十四·一七六c）
7. 慈云：如萬鈞之鏞，星樓受礙，搖杵一擊，聲振寰區。（正續十四·一七八a）
8. 慈云：牛跡巨海，何可校量。（正續十四·一七九b）
9. 慈云：意者但一人，具修三觀，卽名爲齊。（正續十四·一八〇d）
10. 慈云：心自取心，自成心病。（正續十四·一八三d）
11. 慈云：然空華一揆，美惡情分。（正續十四·一八四）

（二）見於「圓覺經大疏鈔」者：

13. 慈云：帶能非證，示過彰非。（正續十四·一八四c）
14. 慈云：嗟時行者，畜病爲功。（正續十四·一九〇a）
15. 慈云：心形起滅，理況空華。（正續十四·一九二b）
16. 慈云：且世珍盈利，能爲漏果之資。（正續十四·二〇一）

○二 a )

17. 慈云：然論周理，盡合圓修，就習引人，偏許一門之善。（正續十五·五d）

18. 慈疏云：然因法出塵，法爲舟筏。（正續十五·一五b )

19. 慈疏總判五名云：初圓照總持，二契經宗決，三三昧根本，四寂滅常境，五真妄合分。（正續十五·三七b )

20. 慈本文云：能招漏果之資。（正續十五·三八a )

筆者不憚其煩，將宗密「圓覺經大疏」及其「疏鈔」中，引用惟慈疏之文錄出，並註明頁次，用以證明宗密以前，不僅有圓覺經流行，而且圓覺經的注疏，已爲宗密廣泛引用，證明圓覺經絕非宗密僞造的。

胡先生爲我國近代知名的學人，其盛名享譽國內國外，過去我對胡先生治學的成就，給與很高的評價。這次有緣重讀胡先生「禪學案」各文，就治史的立場而論，我對胡先生的治學方法與態度，總是感到失望的，故對其治禪宗史的成果，不能不給予重新評估。一個治史的學者，對其所研究的問題，不去廣泛搜集史料，客觀的研究論析，僅憑主觀心態的妄測，怎能對問題有廣度的了解。圓覺經是否爲僞造的經典，我想那是另一論題。縱然它是中國人僞造的，但也絕不是出自宗密之手。我們從史證上可以加以肯定的。

胡先生去世已經十多年了，我想胡先生如若尚在人間，能夠讀及此文，我不知道胡先生有何感想？大概只有默認治學的疏失罷了！